

任弼时提议写“毛泽东传”

1978年初秋,湖南省汨罗县文化馆的两位职员——后来的著名作家甘征文与韩少功,为修改他们合著的传记文学《任弼时》而拜访萧三,得到了“大力帮助”并“获得大量的材料”。访谈结束后,萧三又想起“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生平”“还有一件事”没有说到,便追加一函,补叙了任弼时支持他写“毛泽东传”的经过:

1943年春夏之交在延安,我们谈及本年冬天毛主席满50岁了。弼时同志郑重地对我说:“萧三同志,你写一本毛主席传略,庆祝他的五十大寿,何如?”弼时同志当即用铅笔(那时在延安领导同志,包括毛主席,都惯用铅笔写便信、便条)写了一个信给谭政同志,后又写给陈正人同志一信,都是介绍我去谈毛主席革命实践的……

任弼时的提议,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。萧三信中写道:

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极力赞助,要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找人谈话,用两个月的时间写,恰好就可以赶上毛主席五十岁生日了。乔木同志并要管理局安排我的生活,并说,我可以不去党校参加整风、审干,专写毛传。

任弼时(1904—1950),湖南湘阴人。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常委之一。胡乔木(1912—1992),本名胡鼎新,江苏盐城人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,他们两位对写作“毛泽东传”的高度热情,固然首先是为党的工作需要计,同时也必须承认投入了他们个人对毛泽东的热爱敬仰之情。

萧三欣然领命。他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,又同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,风华正茂少年时,他们曾一起“朝咏诗于晨曦中,夜执笔于油灯下”;一起登岳麓山,游湘江中流击水。他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,一起创办《湘江评论》,一起为组织出国留学而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……后来萧三远赴法国勤工俭学,毛泽东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;再后来萧三长期活动于世界文化舞台而见多识广,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更宏观的视野中日趋客观全面。1938年在苏联,萧三曾写过一篇题为《毛泽东》的长文在莫斯科发表。这篇长文等于“热身”,从经验和史料等多方面为“毛泽东传”的写作打下了基础,萧三生性耿直,胸怀磊落,有实事求是之风,无苟且奉迎之意。传记写作所必须的史实史德,萧三都具备。“毛泽东传”由他来写,可谓任弼时的知人善任。

《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》发表

萧三的工作从搜集史料入手。他在任弼时的支持和帮助下,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出介绍信”,“仅在一九四二(应为三)年五月至十月间”,就“访问了陈正人、蔡畅、谢觉哉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谭政、郭化若、周恩来、何长工、贺龙、朱德、叶剑英、王震、张鼎丞、胡耀邦、胡乔木、李维汉、李六如、叶子龙等几十位同志,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”。(王政明《萧三传》)

按照任弼时和胡乔木的安排,萧三在1943年12月26日毛泽东五十寿辰之前完成了《毛泽东同志略传》,并送交任弼时等审阅。却无奈“毛主席坚决不肯做寿”,又当面亲口劝说萧三不要出版。“寿礼”做不成,“略传”只好“休矣”。而萧三却不肯“休”,“毛泽东传”他是写定了。半年之后,他把“毛泽东传”的一章《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》,投给了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。为庆祝“党的纪念日”(艾思奇语),《解放日报》于1944年7月1、2两日予以连续登载。

那是一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,主要从务虚(宣传与组织)和务实(策划并实施)两方面记述了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。1920年秋冬季节,毛泽东从北平回到长沙之后,一面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,一面开展社会政治活动。首先,他发起成立了许多革命性质的群众组织:例如“文化书社”、“船山学社”、“自修大学”、“湘江中学”、“青年图书馆”、“湖南改造大同盟”、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、“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会”等等。“在这些机关里,集合了差不多湖南全省先进的、革命的、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,培养了不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,这些机关成为了共产党的合法的组织。”尤值一提的是,作为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基地,这些机关竟与不少当时的社会名流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往,比如“赞成过二次独立的省议员仇鳌等”曾“光顾”“自修大学”,“文化书社”的招牌则出自退职后的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之手……在此基础上,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。比如为反抗北洋军阀政府,毛泽东与彭璜、龙坚公三人联名发表宣言,主张“湖南独立”,并为争取社会各界对此“宣言”

的支持而走上街头散发传单;比如为抗议军阀指派地主豪绅作议员攫取政权,亲率市民群众捣毁湖南省议会等等。

写于1944年6月30日的两封信

1944年6月30日,登载《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》的报纸问世前夕,《解放日报》副刊部副部长周立波(1908—1979)和《解放日报》副总编辑艾思奇(1910—1966)分别给萧三写信祝贺,两封信都写得热情洋溢欢欣鼓舞。先看周立波的信:

萧三同志:

你写的毛主席传“伟大的五十年”的一部分,我们先睹为快了,感到莫大的兴奋。我们祝贺你的成功,并希望你能于最近期间内把全书写完。这是对于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。就现在看到的这一部分看来,内容的丰富和教育意义的深长,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中外作家所写的关于毛主席的书。这将是有世界意义的一个作品,因为你写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。

整风以后,我们党的样样工作都好了,文化文艺工作也强起来了,但是还要强一些,以便迎接全国范围的光明,让我们更加紧紧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旗下,踏踏实实多搞出些成绩。

你的这个最有价值的工作,是否今年能全部完成?如能在八月建军纪念日再发表一段,那就顶好了。

因为兴奋,写了这些。专此布礼!

立波 六月卅日下午

周立波是成长于“左联”时期的青年作家。满怀憧憬奔赴延安后,他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,几乎立刻就成了“革命圣地”形象的信仰者、维护者,成了“红色延安”精神的宣传者、实践者。对革命的满怀忠贞,对领袖的由衷敬仰,让他心悦诚服地做了名副其实的“歌德派”。“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”(罗银胜:《周扬传》),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掺杂其间,他的“歌德”因此而正大光明且理直气壮。这种感情,他曾在《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》中尽情抒发:“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,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,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,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,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,共产主义,真诚,毛泽东:真诚……”

对周立波这种“真诚的感情”,现在肯定有人会不理解、不相信,但它却实实在在为一个时代所共有。这种需要与崇拜,应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集体情结——艾思奇的信可以佐证。

萧三同志:

你写的毛主席传记第一篇在党的纪念日登出了。编辑室内的我们,得先睹为快,是非常荣幸的!这是一篇大作,说它将要轰动世界,也不算夸张。谨祝你的成功!

来稿以后最好找稿纸写或按格按行写,草字少一点,因为我们的工人校对,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,草字多又不按格写,难免有错字,而这样的文献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,请酌致歉礼!

艾思奇

30/6

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哲学家,一个站在最具知性、理性、思辨性学科前列的佼佼者,面对“毛泽东传”的初次发表,信中表露的情感却一点儿也不比作家含蓄、婉约。不同之处只在于:周立波写信既为祝贺也为邀稿,艾思奇则在信中对所期盼的后续稿件提出了书写规范的严格要求。因为萧三的文稿“草字多又不按格写,难免有错字,而这样的文献,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”……

萧三的心愿

毛泽东既不肯做寿,也不肯作传,《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》以后,《解放日报》再未收到过相关文稿——不是萧三不写,是毛泽东不让他再写。具体情况,萧三在写给“少奇、康生、伯达诸同志”的信中有清楚地记载:

……毛主席本人知道我在作这件事,曾几次阻止过——从面谈时谦虚地说自己只是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,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当先锋,我只是一个廖化而已,再做几年革命再说”……“比起列宁,斯大林来,我只能是个娃娃”,……直到经乔木同志正式通知我,要我停止这个工作……

令行禁止,毛泽东的谦逊把“毛泽东传”摁在摇篮中蹉跎了两年。直到1946年5月,萧三要去晋察冀了,向毛主席辞行时才忍不住又谈到了它。在延安的这“最后一次谈话中”,萧三的执拗获胜,毛主席终于“松了口”说:“那你就搞下去吧。”有几次并且提示过某几点意见和补充了些事实(关于湖南之运动的)。又曾答应对从政治上校正一下……“得到了‘解禁令’,萧三不胜惊喜,赶忙重新收拾行囊,把与“毛泽东传”有关的资料都装上带走,实在带不

一部没有完成的「毛泽东传」

□许建辉

难却不畏难,而是很冷静地分析困难之后很真诚地寻求帮助。他谦虚好学勤勉上进的品格,在他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鲜明呈现:

以我的才疏学浅、斗争经验少等等,写这样一本书,写这样一个巨人,实在不能胜任愉快。因此我在执笔时总是兢兢业业的。但为了学习,这项工作又是一种好的鞭策。承同志们的帮助——从谈材料到原则上的指示,这本书如能写成(我打算再花几年工夫),如能作为将来修党史及学习毛泽东思想者的一个参考,则于愿已足了。

“毛泽东传”版本

1946年7月,萧三著《毛泽东同志略传》由新华书店冀中支店出版。64开



1939年延安,毛泽东、萧三与红小鬼在交谈

动的交给了柯仲平,让他尽快想办法给自己捎去张家口。好不容易争来的“写作权”,萧三深恐稍纵即逝,他必须抓紧。从延安到张家口到阜平到平山到冀中前线,他一路走一路构思一路找人访谈征集资料。不是按一般传记的写法顺时而下,而是哪一部分资料充分构思成熟就先写哪一部分。初稿写成后先找人拿去读,读了提出意见他再去改,反反复复,紧张紧张。晋察冀两年,为写“毛泽东传”而奔波劳碌成为他的生活“常态”。

对周立波这种“真诚的感情”,现在肯定有人会不理解、不相信,但它却实实在在为一个时代所共有。这种需要与崇拜,应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集体情结——艾思奇的信可以佐证。

萧三同志:

你写的毛主席传记第一篇在党的纪念日登出了。编辑室内的我们,得先睹为快,是非常荣幸的!这是一篇大作,说它将要轰动世界,也不算夸张。谨祝你的成功!

来稿以后最好找稿纸写或按格按行写,草字少一点,因为我们的工人校对,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,草字多又不按格写,难免有错字,而这样的文献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,请酌致歉礼!

艾思奇

30/6

从毛主席50岁的那年开始收集材料,想写一部比较完全的毛主席传(康生同志、弼时同志是最初恩恿我作这件事的),到现在五年了。除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过一章(《初期革命活动》)及在《晋察冀日报》登载《伟大的五十年》之一章

毛泽东同志的学说,理论,实践——毛泽东思想,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,他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。

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学说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得到了发挥、应用与发展的思想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、中华民族、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指南针。毛泽东思想的各方面是整体的,是内部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。他的学说不朽的,是会随着客观实际的改变前进而不断发展的。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——这是每个共产主义者,中国每个爱国的人士应有的任务。

这两段文字,内容形式遣词造句都像极了毛主席去世后的“盖棺论定”。70多年前萧三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刻程度,由此可窥一二。

1949年8月,《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》由新华书店出版。这是“毛泽东传”的另一章,也是“毛泽东传”的又一个版本。这部书的初稿,曾以复写件送刘少奇等同志审定,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看过并转手“将该稿送给乔木同志”。胡乔木读罢给萧三写信说:

很欣幸看到你的稿子。我只有两点小意见请你参考:一、开始的一节我以

读这段引文,能明显感觉到萧三的焦灼。这种心态的产生,估计与萧三对他的传主日甚一日的深刻了解紧密关联:因为越写越知道毛泽东的高度,所以越写越明白写“毛泽东传”的难度。但这里要说的是萧三的令人肃然起敬处:他知

为不妥,用反抗父师开始,易给中国普通人民一种不良印象。引的路德威、巴比塞、斯诺,也易使程度低的读者一望生畏,且与全书体裁不合,不如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家庭,写其家庭的地理环境、经济状况、人口状况。二、写你与他同学时期,我想仍以第三者口吻叙述较为得体,亦免与全书口吻不合(左琴科的列宁故事你想是看过的,如忽然插入左与列谈话一段如何呢?)。

胡乔木的“两点小意见”,实际是运用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提出的两点批评。首先,他认为“毛泽东传”是为“中国普通人”与“程度低的读者”即工农兵所写,应该为工农兵喜闻乐见才行。其次,他建议叙述人称要前后一致,以求写法上更符合人物传记的文体要求。两点批评中肯綮,言之有物有据又有情,让

人民共和国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,刚刚“站起来了”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,奋发图强。“爱国、爱党、爱社会主义”等字眼,成为全民共识变为集体行动。领袖传记的出版,俨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是否可以说,20世纪50年代对毛泽东的热爱与敬仰,正是国人有信仰、有自尊、有自信的一种具体表现?毕竟,这样的“崇拜”,是一种能凝聚民心、汇集群力、指涉未来、鼓舞前进的精神正能量,是任何一个有梦想有前途的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。

“毛泽东传”再版始末

“文革”之后,万象更新。国家需要正能量,民族需要正能量。有良知有见地有担当的文字工作者们,因此想起了萧三和他的“毛泽东传”。“五十年代初期主张印行《青少年时代》的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奉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,临走时再三嘱咐自己的同事黄伊编辑:“中青社一定要再版《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》,一定!”

黄伊是著名长篇小说《烈火金钢》的责任编辑,是《红旗飘飘》丛书的主创人之一。1979年5月4日,黄伊“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”了萧三的名字,知道萧三已经“解放”,5日10日便致信自己“熟悉和爱戴”的老诗人,急切地表达了“希望能在一二年内”看到“毛泽东传”出版的愿望,敦促他“不要再拖了”。黄伊告诉萧三:

老人家(指毛泽东——笔者注)去世以后,尽管有不少单位编写了不少老人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,但许多人都没有写得像您那么通俗、生动,富有文学味。而有些人,就是取材于您那本二三十年前写的书。

黄伊的信如同一团火,点燃了老诗人压抑已久的激情。自己二三十年前写的文字如今还能为人所用,萧三因之而感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价值!他为之欣喜,更为之着急!耄耋之年,来日无多,而“毛泽东传”还有许多内容只是草稿,写在纸上的部分章节也还有待修改润色。前路茫茫,时不我待,萧三立刻开始了对《青少年时代》的修订——主要是对一些史实细节的考证,因为“事实完全正确、详尽”的标准他一直铭记在心。蒙冤受屈二十余年而痴情不改初衷不变——信仰之伟力,实在让人感佩!受他的精神感召,凡被求助者,没有谁不热情援手,萧三因此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真材实料,其中以毛主席的大舅哥杨开智提供的信息最为典型:

萧三欣然接受且满怀感激。

《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》问世4个多月后,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:1950年1月1版,3月2版,7月3版……随着日、德、英、捷克等文字版本也同步发行,“毛泽东传”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。1951年4月27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创刊,从第2期开始刊出“毛泽东传”的另一章《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》。1954年,中国青年出版社将《青少年时代》与《努力于工人运动》整合出版,《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》一书由此问世。

“毛泽东传”引发读书风

“毛泽东传”的广泛传播,迅速引发了一场“读书风”。从新闻出版单位每天都会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,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万众踊跃致信洛阳纸贵的高涨热情。其中一些具有商榷性质的信件是直接写给萧三的,举例如下:

1951年5月14日,广州蔡安存信,不同意《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》中关于蒋先云“攻武汉时牺牲了”的说法。蔡说:“我记得蒋先云同志1927年春为第七十七团团长,是由武汉继续北伐时,在河南省攻临颖时阵亡的。那时我在担任军医工作,记忆大约不会有错的,因当时我的心情受很大的刺激。”考虑到“事关革命史料”,蔡安存特意提供了调查线索:“这事蔡廷锴同志亦或记忆的,他那时是第十师师长。”

1951年5月30日,长沙周定一信,不同意《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》中所记长沙“六一惨案”的发生时间。周说:“1925年我正在长沙读初小,那一年的6月1日曾在省教育会参加过‘六一惨案’纪念会,会后抬着放大的黄、王两烈士的尸体照片去游行,叫口号,还唱着‘六月一日惨剧长沙,黄王二君横死暴力下,帝国主义日益逼中华,国民起来,努力打倒他!’这么一个纪念歌。这次游行给我的印象很深,所以我记得惨案的发生不是在1925年。”

1951年6月26日,天津马铎信,对《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》中萧三所写“作者的话”提出批评:“毛主席说过:目前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(大意),我觉得与萧三同志提的‘最后的、完全的、彻底的胜利’有些不一致……”

1950年7月3日,上海杨重光信,通报他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考证结果,以纠正“毛泽东传”中的叙述错误。信中说:

关于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亦即成立大会的会址问题,最近经过一个来月的调查和考证,已经找到了。……党的诞生地并不是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(不是博爱女校),而是李汉俊的家里;而李汉俊的家当时是住在望志路76和78(现在的兴业路106和108号),这是两间沿街的弄堂房子,后门即从贝勒路的树德里出入。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是在76号的租房楼上举行。博文女校并没有在那里开过会,那所学校只是当时远道而来的代表包括毛主席等在会前耽搁的地方。

读着这些来信,仿佛触摸着那个时代的脉搏,铿锵作响,强壮有力。新生的

杨开智的回复让萧三“无似感激”。依信中所谈,他一一修改了书稿的相关内容,比如把“主席说‘我们是一家人,不分彼此’”写进了书中,把写杨开智烈士“被砍头”改成了“被枪杀”等等。1978年5月,萧三为通报上书稿修改情况致信杨开智,信中弥漫着夕阳山老马长途的无奈与悲凉:“这只是书中的一页,其余章节,也都煞费考证、整理。全书何日竣工,尚很难说。”

1980年7